



文史哲博士文丛

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

◎ 周志雄 著

齊魯書社

© 周志雄 著

中国当代小说 情爱叙事研究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周志雄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5

ISBN 7-5333-1652-5

I. 中... II. 周...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 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4866 号

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

周志雄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652-5
1·319 定价: 18.00 元

序

王万森

当初，志雄把他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看到“情爱叙事”的选题，不由地一愣，觉得有些诧异。志雄读书的刻苦与执著是大家所熟知的，读博的三个春秋基本上过的是“闭门读书”的日子，一台电脑，一架图书，几张卡片伴他苦读，心无旁骛。还有，尽管来自湖北，举手投足间不时流露出南国学子的灵动风韵，可是在我的印象中他毕竟跟情意绵绵的话语方式相去甚远。因了这些印象，便感到他的选题有些始料未及。

在这种直觉之外，我还意识到这个选题的难度。学位论文的选题，或者选显豁的题目，价值突出，引人注目；或者选有待发掘的领域，填补空白，赢得开拓之功；唯独“情爱”这类题目，学术界倍加关注，硕果累累，已经难以获取新的阐释空间；随着社会转型，“情爱”成为世俗化的大众话题，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商业化炒作，又使得这一话题流于低俗化，乱花迷眼之际难以辨认学术的路径，增加了梳理和判断的不确定因素。的确，“情爱叙事”选题的难度相当大，论文写作将遭遇事倍功半的艰难局面。

然而，志雄坚持做这个选题，自有他的道理，而且清醒地选择了适合自己审视的角度和视阈。“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严格意义上以言情为主要故事情节的纯情爱小说，而是小说中有关

两性情爱的叙事形态。本文认为采用叙事研究的角度对小说进行分析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角度,这当然还只是一种尝试。”他对自己选题的解释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选题的角度,二是挑明“是一种尝试”。对于后者,我不认为这是一般的谦辞,而恰恰是自信。既然给自己提出“尝试”的命题,那就肯定有的可“尝试”,自信可以把握“尝试”的开拓性空间。至于前者,以“不是……,而是……”的句式所表明的,自然是对于选题角度的明确定位,笼统地说这是“将‘两性情爱’在小说中的叙述作为一种文学存在”,确切地说,这是要探讨“情爱叙事”这一选题的二度空间。显然,本意并非要抛置“情爱小说”于不顾,仅是不止于此而已,选题要穿越的是“叙事形态”这一敞开的二度空间。从小说文本走入“叙事”的各式各样的模块和体式之中,这是一个别样的世界,形态迥然,异彩纷呈,仿佛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门,又仿佛走进语码的密林,由“叙事”引导去破解蛰伏的一个个情爱密码。应当说,“情爱叙事”的选题化难题为饶有意味的价值诉求,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值得称道的还有,论文结构内在的两大范畴构成论述框架的坚实支撑。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情爱叙事”的坐标,纵轴是“历史与人”,横轴是“形式主义与历史叙述”。

对于文学而言,“历史与人”原本同是题中之义,“人的回归”和“历史的还原”几乎同时成为新时期文学复苏的鲜明标志,成为文学行进的两个轮子。由于“历史与人”有着各自的理论资源,强势的西方话语资源对两者的渗透是分头注入的,文化思潮的迅猛态势推动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疾行,乃至造成两者在文学思潮中的错位现象,流行各自抽象化的表述。这种结构性的裂隙,在志雄的论文架构中得以弥合,并铸成整体性的支柱。赖

以实现浇筑、弥合的，正是“叙事”。“情爱叙事”应该是完整的结构，“人”作为“核心”和“主体”立于其中，而历史作为“母体”存在其中。“情爱叙事”整合“历史与人”于一体，它的“两个维度——历史和人都是动态而丰富的”。

形式主义与历史叙述的分野显而易见，在 20 世纪文学批评领域被作为“内在的”研究与“外在的”研究两水分流，形成相对独立的两大流派。从学术资源和学理命脉上讲，这种划分不无道理；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界由于理论和方法的匮乏所造成的文化期待，无疑是雪中送炭。但也由此带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式的悖论。在良性吸纳和有效借鉴的同时，“西方叙事学繁琐的分析方式和唯形式的技术分析必然带来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隔阂的危险，这是中国的文学批评者们所不能接受的，文学仍然被看作是一个产生社会意义的精神生产方式，文学还没有变成纯粹的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的外在条件，这是叙事学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发生变形过滤的现实原因”。这种机敏的参悟和清醒的思考，出自“合目的性的”阅读体验以及“情爱叙事”审视中的理性认知。由此出发，确立了叙事建构的支点：文学的形式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内容和意义，“外在的”研究应该和“内在的”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采取整体研究的方式。问题的解决，仍然是受到韦勒克的启发：“我以为，唯一正确的概念无疑是‘整体论’（holistic）的概念，它将艺术品视为一个千差万别的整体，一个符号结构，然而却是一个隐含着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

论文看重结构，同样看重机理。体现“情爱叙事”机理的是文本解读、叙事阐述和话语运作。话语中可见功力，解读中不乏才气，阐释中颇有见地：用这样三句话来评价志雄的论文演练，应当不算是溢美之词。

作为老师,我更看好志雄的虚心好学,孜孜以求。他是能坐得下,又坐得住的人。为把论文写好,多方奔走,访求名师。他具备了做学问的良好心态和基本素质。当然,对于博士论文写作的要求应是“发现”与“阐释”俱佳。比较而言,志雄的论文“阐释”方面较强,而“发现”和“创新”的方面稍弱。诚然,这不仅仅是志雄个人的问题。可是,创新和超越的目标却是无论如何也不容忽视的。愿与志雄共勉。

目 录

序.....	王万森(1)
绪论.....	(1)

上篇 小说情爱叙事的历史空间与话语空间

第一章 历时与共时的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	(16)
第一节 情爱叙事与历史的遇合与疏离	(16)
第二节 情爱叙事与人性的探询	(34)
第二章 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性别话语	(49)
第一节 情爱叙事——颠覆与建构的性别话语	(49)
第二节 想象的异性——被强化的与被弱化的	(66)
第三节 性爱叙述——生理的与情感的	(76)
第四节 性别话语——对抗与和解的战争	(92)
第三章 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影像化.....	(105)
第一节 电影——小说情爱叙事的另一种方式.....	(105)
第二节 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影像化解析.....	(119)

下篇 小说情爱叙事的多维透视与个案分析

第四章 小说情爱叙事的多维透视.....	(169)
----------------------	-------

第一节 情爱叙事的深层意蕴·····	(169)
第二节 争议的性爱叙述与修改的文本·····	(180)
第三节 精神分析与小说中的性爱叙述·····	(193)
第五章 小说情爱叙事的经典建构与时尚话语·····	(208)
第一节 十七年经典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208)
第二节 情爱叙事与小说的结构·····	(224)
第三节 网络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236)
第六章 当代作家、作品情爱叙事个案分析 ·····	(253)
第一节 张旻:游走在想象与现实之间 ·····	(253)
第二节 《匪风》:理想神话与人性乌托邦 ·····	(264)
第三节 《无字》:繁复·锐利·偏执 ·····	(271)
结 语·····	(283)
参考文献·····	(290)
后 记·····	(297)

绪 论

一、一个情爱叙事繁荣的时代

自新时期以来,文学开始回归到人学本体之中,情爱问题备受文学关注,各种文化传媒也纷纷参与其间,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从严肃文学到通俗纪实,从影视剧到 MTV,从流行音乐到网络快餐,到处可见一个两性情感的主题。书市上充斥着大量的针对不同群体的婚恋情感调查报告与绝对隐私实录,有大量的从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婚姻史、性史、家庭史、情爱史。可以说在一个感官张扬的时代,两性情爱问题是一个几近泛滥的文化问题。近二十多年是价值体系多变的时期,情爱状态作为衡量社会文明的一个尺度,在这个时期里的纷纭变幻表现得既突出又令人触目惊心。

在诸多文体中,小说无疑是当代最发达的文学样式,有资料显示,上个世纪末中国每年长篇小说的数量近千部,这个数量相当于建国后十七年长篇小说数量的总和。诗与戏剧有着灿烂的历史,小说作为后起的文学样式无疑是后来居上的。小说的兴起与市民文学的兴起直接相关,市民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就是情爱问题。中国通俗文学有一个才子佳人的文学传统,言情是唐

宋传奇以及明清话本小说的三大题材领域之一(另两大题材是公案和传奇),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都是讲述男女之情。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史上,“五四”时期的小说大多是情爱小说,左翼文学中存在“革命+恋爱”的模式,《青春之歌》、《三里湾》、《林海雪原》、《山乡巨变》、《红旗谱》等红色经典小说中都包含情爱叙事的情节线索。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也大多与两性情爱问题密切相关,几乎可以说不写两性情爱就没有小说。新时期小说与情爱题材的关系更是紧密,自“伤痕小说”以来的每一波文学浪潮之中,都留下了很多情爱题材的名篇佳作。情爱题材又是最容易引起人们争论的,从王安忆的“三恋”到张贤亮的《习惯死亡》,从贾平凹的《废都》到卫慧的《上海宝贝》,从陈染的《私人生活》到春树的《北京娃娃》,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繁荣有着现实的原因,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多重文化资源的合力随同变化的时代主潮一起造就了不同群体的作家,他们不同的经历和审美趋向共同创造了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众声喧哗的文学局面。

本书对“叙事”的理解并不囿于纯粹形式主义层面的叙事学意义,而是将“两性情爱”在小说中的叙述作为一种文学存在,看作是一种包含形式与意义的文化语码,它包含具体的情爱事件、情爱活动中的人物,还包含叙述情爱事件的文化背景、叙述者的立场、叙事背后的动因、叙事的效果、情爱叙述对文体结构的影响等,因而本书的研究对象不是严格意义上以言情为主要故事情节的纯情爱小说,而是小说中有关两性情爱的叙事形态。本文认为采用叙事研究的角度对小说进行分析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角度,这当然还只是一种尝试。叙事性文本往往能比较深刻

地探讨情爱问题本身所包含的意义,这是因为:“叙事文是一种能以较大的单元容量传达时间流中人生经验的文学体式或类型。”^①面对这种文学体式,“研究叙述的视角可以相当多元,不妨从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等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去讨论。即使我们将讨论的范围仅仅局限于文学性叙事,研究的角度也依然五花八门。但是,说到底,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②。本书的做法正是在形式主义和历史叙述之间找到平衡,从多个角度对当代小说情爱叙事进行韦勒克所说的整体研究。本书的构架是宏观的,但具体的切入却是微观的,是从对具体的作品重新解读入手的。

二、情爱叙事分析的方法与意义

西方的叙事学致力于分析文本叙事背后深层的模式、结构、原则,“正如语言学家们从复杂多变的词句中总结出了一套语法规律,叙事学家们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故事中抽象出一套故事的规则,从而把变化多端的故事简化为容易把握的基本结构”^③。源于西方的叙事学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盛,叙事学试图将文学研究引向科学研究的道路,走向纯技术的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的思路对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重主观印象的中国传统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

① [美]浦安迪教授讲演:《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② [美]浦安迪教授讲演:《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③ 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4页。

评之外,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中国当代的批评家对叙事学理论并不陌生,罗朗·巴爾特的《叙事作品分析导论》、W·C·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等叙事学专著都有中译本。我国学者这方面的理论专著有罗钢的《叙事学导论》、董小英的《叙述学》、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等。将叙事学理论用于文学研究的著作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杨义的《中国叙事学》、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等。比较有影响的对作家个案研究的叙事学著述有对鲁迅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如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中第三篇所做的叙事学研究,王富仁的长论文《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等。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叙事学研究的规则与分析方式过于繁琐,中国的叙事学文学研究往往只取西方叙事学的一些灵魂式的思路,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使用西方叙事学的工具来解读中国古代叙事文体中内在的文化内涵,基本定位是文化研究。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采用的是自己改造过的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如何实现叙事模式的现代转换,研究的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变化过程,是用叙事学来研究文学史。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也不是严格的叙事学分析,而是采用叙事学的方式来研究鲁迅的内在精神结构,是用叙事学来研究精神现象学。王富仁的《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将鲁迅小说叙事形式上的特点看作是蕴涵文化意味的符码,是通过叙事学的角度对鲁迅小说进行文化分析。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对当代“文革”小说抽样分析,“整理和探讨文革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同时也分析

这些文革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及其叙事功能,最后再辨察这些文革小说的几种基本叙述类型”^①。全书采用叙事分析的方式归纳了“文革”小说的 29 种叙事功能,4 种叙事模式,得出的结论是“文革”小说不同叙事模式中的文化内涵。简而言之,就是借叙事分析的方式进行文化批评。

20 世纪文学的研究大体上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俄国形式主义、欧美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科学”实证分析;一类是以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为代表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研究。前者被称为是“内在的”研究,后者被称为是“外在的”研究。对于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关系韦勒克说得很明白:“我曾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称为‘内在的’研究,将对作品同作者思想、社会等等之间的关系的的研究称为‘外在的’研究。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应忽略甚至是蔑视渊源关系的研究,也并不是说内在的研究不过是形式主义或不相干的唯美主义。说得准确一些,经过仔细斟酌才形成的符号和意节的分层结构的概念,其目的正是为了克服形式和内容相分离的旧矛盾。在一部艺术作品之中,通常被称之为‘内容’或‘思想’的东西,作为经过形象化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了作品的结构之中。否认艺术与人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和形式研究之间设立障碍,这决不是我的意思。虽然我曾向俄国的形式主义和德国的文体学家学习过,但我并不想将文学研究限制在声音、韵文、写作技巧的范围内,或限制在语法成分和句法结构的范围内;我也并不希望将文学

^① 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3—4 页。

与语言等同起来。我认为,这些语言成分可说是构成了两个底层:即声音层和意义单位层。但是,从这两个层次上产生出了一个由情景、人物和事件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等同于任何单独的语言因素,尤其是等同于外在修饰形式的任何成分。我以为,唯一正确的概念无疑是‘整体论’(holistic)的概念,它将艺术品视为一个千差万别的整体,一个符号结构,然而却是一个隐含着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相对主义的好古主义和外部的形式主义,两者都是企图使文学研究非人化的错误尝试。批评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从文学研究中排除出去。”^①西方叙事学繁琐的分析方式和唯形式的技术分析必然带来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隔阂的危险,这是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们所不能接受的,在当下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学仍然被看作是一个产生社会意义的精神生产方式,文学还没有变成纯粹的自娱自乐的文学游戏的外在条件,这是叙事学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发生变形过滤的现实原因。另一方面也正如韦勒克所说的,文学的形式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内容和意义,“外在的”研究应该和“内在的”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采取整体研究的方式。如何实现这种整体研究呢?文学的认识、教育、娱乐、审美功能使小说总是为不同年龄、身份、国别的读者所共同喜爱和阅读。接受者的阅读审美期待与创作主体的情爱观念和艺术追求在不同的层面上形成了情爱叙事丰富的背后“原型”或“模式”。情爱叙事的两个维度——历史和人都是动态而丰富的。在封建时代,情爱叙事成了反抗专制婚姻、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呼声;现代主义文化思潮

^① [美]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微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277页。

在情爱叙事中注入了情爱本体意义上的哲学意味；消费文化时代，情爱叙事中多了一些日常化的细节和张扬感官的欲望化叙述。情爱叙事总是在感性和理性、现实和理想、观念束缚和诗性自由的纠结中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一个现代意义的爱情是以人为本的爱情，爱情追求心灵的自由，爱情对抗物质束缚，爱情反对物质交换，爱情对个人意味着快乐和幸福也意味着新生和动力，这也是文学的诗性所追求的。情爱叙事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一种创作者认为的更为合理的情爱观念。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一些理论家所认为的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在于“显示”与“讲述”的差别进行了仔细分析和论证，他提出了“隐含的作者”的概念，他认为作者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说的一种基本要求是读者需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中作者要他站在哪里。情爱叙事研究就是力图在叙述者、读者、文化语境、观念模式、内在心理结构等元素的关系中来透视情爱叙事深层的结构和意义。

“大多数所谓的艺术虚无主义远未达到这种完全的否定；几乎所有作者都认为，某种意义是存在的，至少在艺术创作的活动中如此。自从康德以来，非哲学的作家所共同的哲学假说，就是一种主观的艺术主义：存在着价值，但它只是艺术家从混乱中创造出的东西。”^①情爱叙事研究对叙事的价值、意义的发掘是在文学的本体意义上展开的，叙述者总是无法逃离意义的表达，即便是最虚无的价值消解也代表了一种价值立场。在叙事学看来，叙述的价值立场有叙述者与被

^① [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叙述的人物之区分,叙述的情节与叙述的长度、语气、密度中都可能隐性存在价值倾向。叙事的价值立场并不总是清晰的,有时候是含混的,甚至是叙述者自身的自相矛盾、似是而非,这在文学中并不鲜见。“莱昂内尔·特里林阅读纳伯科夫的引起争论的作品《洛莉达》时,曾表示他不能决定,是以严肃的态度,还是以嘲讽的态度,来看待最终叙述者对于自己不道德行为的告发,他又赶紧解释说,这种含混使得小说更好,而非更糟糕。他说:‘确实,《洛莉达》对我产生的吸引力之一,是它的含混的语气……和含糊的意图,它能产生不稳定性,使读者失去平衡。’此外,由于极力主张‘道德上的灵活性’,作品独特而完美地再现了‘美国生活的某些方面’。论点是清楚的。我们生活中的道德标准是含混不清的,这本书使得这种道德标准越发含混——也许,它使我们比过去更加失去平衡——因此它的缺乏清晰性也就成为一个优点。”^①道德上的含混是现实生活道德标准含混不清的反映,也致使叙述者的叙事立场变得含混,它在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小说自身的特点:“伊恩·瓦特最近提出,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含混的艺术形式;小说的兴起本身就反映了‘从古典世界的客观的、社会的和公众的方向’向现代生活和文学的‘主观的、个人的和私下的方向的变迁’。因为小说是在一个真实本身似乎日趋含混、相对和变动的世界里,追求他所谓的‘表现的现实主义’,所以它必定要牺牲其他体裁的‘评价的现实主义’的某些东西。”^②在含

① [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页。

② [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2页。